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期末论文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前沿

课程类别：限制性跨学科课

审阅老师：赵文洪

论文名称：尚武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学生姓名：黄蒙

学生学号：B18500290

班 级：2018 级博士 8 班

院 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尚武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简介：黄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电话 18810379816，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 11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邮编 102488，电子信箱 huangmeng@ucass.edu.cn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形成尚武精神所依赖的社会条件。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归纳出四点：（1）社会结构。前现代以军事贵族为核心的社会的上层，和游牧、渔猎社会的全民，通常都具有尚武精神。（2）国际格局。对于平民社会，国家面临的国防压力越大，对尚武精神的需求越大。但从需求到现实，还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来激励微观主体。（3）激励制度。国家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向军人提供的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切实提高军人的待遇、荣誉感并拓宽其上升空间，才能弥补军人的奉献与牺牲，有效激励全民的尚武精神。（4）对国家前途的预期，会强烈地影响尚武精神。大国、强国的国民更倾向于表现出强烈的尚武精神。

关键词：尚武精神 社会条件

一、引言

清末中国遭遇外国侵略，屡战屡败，引发了国人沉痛而长久的反省与思考。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人们开始超越洋务派的物质层面，从制度和他文化层面反思中国积弱的原因。其中，留日华人最得风气之先。得益于日本文明开化带来的信息便利，他们能够近距离感知大国竞争的紧张局势，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渐^①和日本武士道近在咫尺的熏染^②，使他们痛感中国民风萎靡、文弱，率先提出了重振尚武精神的主张。一时间，以梁启超的《论尚武》和蔡锷的《军国民篇》为代表，培育国民的尚武精神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社会思潮。

然而，在中国为何缺乏尚武精神这一问题的解释上，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工具和认识方法，清末人士的探讨不够系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流于表面的。梁启超《论尚武》归纳了四个因素：“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和“习俗之濡染”，分别属于国际关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政策激励层面和文化熏染层面^③。然而这四个因素是各自独立的吗？如果不是，相互间又是怎样一种制约关系呢？梁启超文中没有涉及。但在实践中，这却是重大的问题：如果某个因素是因变量，受到其他因素组成的某种结构的强力制约，那么在相应的结构发生变化前，试图改变这个因变量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例如，社会习俗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受到制度和政策的强烈影响。如果制度和政策不变，妄谈移风易俗，一般都很难取得成效。

因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和归纳史实的基础上，探讨尚武精神的形成条件，以加深对尚武精神从何而来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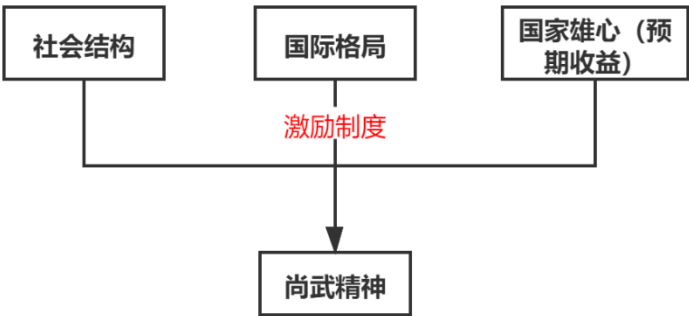
二、尚武精神的形成条件

事实上，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才有了分析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历

^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列国争雄数百年的西方尚且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一个前半生浸淫于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尤为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② 蔡锷《军国民篇》将原因归结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八个因素，与梁启超大同小异。

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意识不会是空中楼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具体到尚武精神，本文认为，它是若干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下文分别讨论。



（一）社会结构

现代社会都是平民社会，没有固定的社会层级，而前现代的许多社会却并非如此。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过以世袭武士为核心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军人和贵族的身份是同一的，他们凭借垄断的暴力攫取资源或获取报酬。因此，这些贵族必然表现出强烈的尚武倾向，因为这是他们赖以谋生的最大资本。例如，在春秋时期的中国，贵族子弟都要接受“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训练，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驶战车，都是典型的军事训练^③。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重装骑兵几乎全部由贵族子弟充当，其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演化为“骑士精神”，传承至今。类似地，在古代日本和雅利安人建立的印度国家，武士都是世袭贵族，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并表现出强烈地尚武精神。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广大被统治阶层祖祖辈辈没有军事义务、不接受军事训练，自然也就与尚武精神无缘。如《曹刿论战》中面对齐国的讨伐，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言语中对本国胜败持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见这种社会的尚武精神并非普及全民的，而只包含军事贵族阶层这一小部分。

那么，前现代有全民尚武的社会吗？当然也是有的，但大多是文明程度较低、所处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游牧、渔猎社会。这些社会的全体成员被迫直面严酷的生存压力，几乎时时刻刻处于天灾的威胁当中。如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生产、打猎和战斗（对手有时候是人，但更多的时候是狼）混杂在一起，几乎永无停歇。对他们而言，尚武精神完全无需提倡，而根本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在那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怯懦的个体和集体早已在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机制中被淘汰出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环境较好的富庶地区纷纷过渡到了平民社会^④，阶层、职业流通的渠道已被打开。即使是军官，也大量由平民担任；而贵族也渐渐不以从军为主要职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本身就很难再直接催生尚武精神了。贵族时代的尚武遗风只能通过艺术、习俗等方式，对后世有所熏染，而且这种熏染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衰减^⑤。

（二）国际格局

进入平民社会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成为激励尚武精神的最根本因素，也就是梁

^③ “礼”“乐”是维持贵族社会尊卑秩序的训练，“书”“数”是行政训练。

^④ 这在中国发生得比较早，中国在战国时代就以“编户齐民”为国本；而在欧洲和日本，都是直到近代才完成了这个过程。

^⑤ 社会基础消失之后，特定的精神也会迅速丧失后世的认同。

启超和蔡锷所说的“国势”。在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紧张、外敌环伺时，频繁的对外战争本身便能够有力地铸就尚武精神；相反，在国家安全非常有保障后，天下太平四海晏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尚武精神也就必然有所回落。

罗马便是如此。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从弹丸之地扩张为地中海的唯一霸权，历经数百年战争，罗马人长期维持着公民兵传统，成年男子几乎人人当过兵，社会普遍以从军报国为荣耀；但在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天下无敌之后，罗马迅速腐化，不光是国家高层沉溺享乐，公民也纷纷视从军为畏途，最终竟不得不大量依赖蛮族雇佣兵保卫国防。

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尤其放大了国际格局这一因素的作用：中国相对孤立地处于亚欧大陆东端，与其他文明地区之间有高原、大漠、山脉的阻隔，所以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无需面对与其他强大文明国家的冲突，更多地处于天下无敌的状态，从上到下感受不到多少国防压力。而且，中国传统疆界已经囊括了东亚最肥沃的土地，继续向外围的贫瘠之地扩张，往往成本极大而所得有限——中国文学传统对开疆拓土多持批判态度，从根本上讲就出于这个原因。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无统一，一千多年间战争不断。特别是近代以来，中世纪两大权威——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都丧失了权柄，欧洲进入了欧洲版的“战国时代”，列强无不将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争夺权力和财富。“战国”式的国际格局必然催生强烈的尚武精神，中外皆然。只是中国在东亚世界天下无敌两千年后，直到清末才被卷入世界体系，重新面对“战国”式国际格局，一时之间难以适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很快，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革命，中国再次适应了“战国”式国际格局。时至今日，作为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官方语言中保留了大量借自战争术语的词汇^⑥，反而堪称世界之最、时常令外国人惊讶了。

（三）激励制度

“战国”式国际格局只能决定对尚武精神的需求，但并不能保证尚武精神的一定出现。从需求到实现，需要一系列激励制度发挥作用。因为对国家这种巨型规模的组织，个人的不畏牺牲换来国家利得后，再返还给个人的链条实在太长了。如果没有合适的激励制度，造成这个反馈链条的断裂或错位，个人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尚武精神便无从谈起。

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尚武精神的一个集中喷涌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代科举的名额非常少，军功则由于对外战争频繁而颇为丰厚，从军成为广大读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渠道。唐代边军中有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边疆历练多年，了解军事生活，留下了雄浑壮阔的边塞诗传统，成为中国尚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文化源泉。与之相反，北宋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在政治权力架构上对军人严防死守，贬武崇文，军人的上升空间有限，日常权力也受文官钳制；再加上宋代大开科举，优秀人才少有从军者；募兵制大量吸纳破产农民，冗兵的素质低下，更加剧了宋代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以上种种，都造成社会精英阶层对军人的不屑¹²和对军事生活的相对陌生——这种社会环境又怎么可能培育出尚武精神呢！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家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向军人提供的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切实提高军人的待遇、荣誉感并拓宽其上升空间，才能弥补军人的奉献与牺牲，激励起全民的尚武精神。即以新中国而言，农民当兵升到一定军衔后可以转业的权利，通过分配工作将自己的身份由农民变为市民。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当兵和高考是农民实现社会层次上升仅有的两条渠道，因而对农民极富吸引力。而台湾地区的义务兵役制，由于缺乏社会层次提升的含义，当兵普遍被视为苦差。“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至今仍作为俗语流行于台湾地区，但在大陆已经很少听到了。

^⑥ 如“获取……的伟大胜利”、“抗击疫情保卫战”、“脱贫攻坚战”等等。

（四）预期收益

对尚武精神的激励制度是国家的主动建设和主动行为，但还有一些国家无法操控的因素，那就是整个国家发展态势的预期收益，是否能够弥补牺牲的风险。

一战之前，法国人为报普法战争之仇，在一战战场上的表现不可谓不勇敢，最终还赢得了大战的胜利。而到了二战之前，法国人的尚武精神已近乎消弭殆尽，战前便有喧嚣的投降思潮，法国战役开始后更是略作抵抗便早早投降。这是为什么呢？一战的胜利国为何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心灰意冷了呢？

答案简单而残酷：法国在一战中得不偿失。德国统一后，国力迅速超越法国。法国能够赢得一战的胜利，靠的是俄、英、美这几个重量级盟友。但西线战场主要在法国领土上，法国为整个协约国阵营撑起了防线，因而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天量的物资消耗，却未能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足够的补偿。不仅如此，英美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反而在战后刻意扶持德国。二战前，很多法国人也想明白了，以法德的国力差距，若无英美的大力支援，法国一国全力备战只是为英美火中取栗，法国仍将得不偿失，那还不如投降。即使不是投降派，看到这令人沮丧的前景，也纷纷走上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路^[3]。

纵观历史，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多是大国、强国，至少也是地区性霸权。因为大国的奋斗有机会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小国的奋斗大多是螳臂挡车、徒劳无功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精神奋发向上，在战争年代勇猛顽强，在和平年代勤奋工作。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处于低谷期，日本能够看到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领导东亚、乃至赶超美国的希望。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崩溃后，日本人先是看清楚了它无力抵御美国的打压，努力奋斗可能都是在为美国人作嫁衣裳；其次又明白了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东亚的领导权不可能归于日本。在绝对的国力差距面前，主观努力就丧失了意义。日本整个社会精神气质的迅速萎靡，由“昭和男儿”变为“平成废宅”，与此直接相关。因此，对国家前途的预期，会强烈地影响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尚武精神尤为典型。

三、结论

一个社会能否表现出强烈的尚武精神，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首先，前现代以军事贵族为核心的社会的上层，和游牧、渔猎社会的全民，通常都具有尚武精神。

其次，在平民社会，尚武精神就不是无条件的了。国家面临的国防压力越大，一个社会对尚武精神的需求越大。但从需求到现实，还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来激励微观主体。

第三，国家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向军人提供的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切实提高军人的待遇、荣誉感并拓宽其上升空间，才能弥补军人的奉献与牺牲，有效激励全民的尚武精神。当然，这些制度安排都是有成本的，因为资源更多地向军人倾斜，而军人本质上不是生产者。所以当国防压力迅速下降后，国家就倾向于取消这些制度安排，从而造成尚武精神的衰退——古代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四，对国家前途的预期，会强烈地影响一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尚武精神当然也不例外地。托克维尔说过，“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身为大国、强国，国家利益具有更高的开拓上限，其国民更倾向于表现出强烈的尚武精神；小国、弱国，若非有宏大的志向^⑦，一般不具备强烈的

^⑦ 蜀汉和普鲁士，便是小国图强的典范。

尚武精神。

参考文献

- [1] 刘一兵. 清末尚武思潮述论[J]. 历史档案, 2003(04): 68-76.
- [2] 王军营.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J]. 船山学刊, 2011(3): 145-148.
- [3] 赵文亮, 彭训厚. 我国学术界关于1940年法国败降原因研究综述[J]. 法国研究, 2006(03): 49-57.